

○○○○○○○

万历十五年

黄仁宇



# 万历十五年

〔美〕

黄仁宇 著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 
三聯書店

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© 200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 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  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##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万历十五年 / (美) 黄仁宇著. —北京: 生活·读书·  
新知三联书店, 2008. 11

(中学图书馆文库)

ISBN 978 - 7 - 108 - 03014 - 6

I. 万… II. 黄… III. 史评—中国—1573~1620 IV.  
K248.30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10502 号

责任编辑 潘振平

装帧设计 朱 钜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)

邮 编 100010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8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

2008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32 印张 12.25

字 数 207 千字

印 数 00,001 - 20,000 册

定 价 32.00 元

## 写在前面

《万历十五年》是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的成名之作，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。黄仁宇一生富有传奇色彩。他 1918 年出生在湖南长沙，1936 年考入天津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。抗日战争爆发后弃文从伍，曾参加中国远征军，进入印度作战。1950 年退伍后负笈美国，以 34 岁的“高龄”从大学三年级读起，终于 1964 年获得密执根大学历史系博士。此后，他先后在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、哥伦比亚大学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任教、从事研究。1979 年曾赴普林斯顿大学，参与《剑桥中国史》的集体研究工作，撰写明朝部分。

《万历十五年》是黄仁宇 1976 年在美国所作，最初用英文写成，书名为 “1587,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”。在投稿屡屡碰壁之后，1981 年耶鲁大学接受出版。有趣的是，该书发行后接连获得了 1982 年

美国国家书卷奖和 1983 年历史类好书两次提名和评论界的关注。

与此同时，1982 年，中文版在大陆发行。

2000 年 1 月 8 日，黄仁宇在美国纽约逝世，享年 82 岁。

青年时代经历过严酷的战争，做过步兵参谋的黄仁宇，在云南瘴气密布的丛林里作战，亲眼见中国的西部是如何荒僻，如何落后，他把自己的这些经历带到了他的剑桥生涯、耶鲁生涯、哈佛生涯，与治学体会融为一体，终于点石成金，写出了《万历十五年》、《中国大历史》、《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》、《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》以及自传《黄河青山》等等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历史和现实作品。

公元 1587 年，按中国传统纪年，是明神宗万历十五年。这一年在中国历史上原本是极其普通的年份。但在这一年发生的许多琐细小事，却如大风起于青萍之末一般成为帝国走向崩溃的前兆。元辅张居正已去世五年，海瑞在这一年也故去了，一代名将戚继光在年底歿了，时年 29 岁的努尔哈赤在东北崛起：始建宫室，布教令于部中，禁暴乱，戢盗窃，立法制……然而朝廷却未予注意；西班牙无敌舰队即将出征英吉利，揭开世界历史新的一页……

作者以该年前后的历史事件及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物为中心，抽丝剥茧，梳理了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层面存在的种种问题，并在此

基础上探索现代中国应当涉取的经验和教训。作者以其“大历史”观而闻名于世，本书中这一观念初露头角，“叙事不妨细致，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”。虽说名为万历十五年，然而全书内容却俯瞰了整个明朝的兴衰。本书自 80 年代初在中国大陆出版以来，20 多年间好评如潮，在学术界和文化界有广泛的影响，成为当代长销不衰的经典历史作品。

有人说，《万历十五年》的成功缘于黄仁宇扎实的明史功底，他花费 5 年作《明代的漕运》，并由此获密执根大学博士学位；他花费 7 年读 133 册《明实录》及相关资料，作《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》；他的《万历十五年》一二十万字，其中参考书目 130 多种，注释五百余条。在这样的学术基础上，再运用他优美的文笔讲述明代的故事，实在游刃有余。他开创了一种新型的历史随笔，用清新俊朗的文字把谨严的学识和博通的史观熔于一炉，遂使他的叙述有一种异于传统通史教科书的新鲜感和魅力。
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編輯部

2008 年 10 月

# 自序

本书的英文版书名为“*1587,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*”，作者的署名为 Ray Huang，1981 年美国耶鲁大学出版。初稿是用英文写的，写成后，出于向国内读者求教之忱，乃由笔者本人译为中文，并作某些修改润色。

我对明史感觉兴趣，说来话长。1959 年，我在密支根大学历史系读书，选定了“明代的漕运”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。这一研究过程花了 5 年。论文完成后，算是对明代的财政税收制度有了一知半解，然而遗留的问题仍然不少。为了解决自己的困惑，并图对明代的财政与税收窥其全豹，乃开始收集材料，撰写 *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16th Century Ming-China* 一书。当时正值台北影印出版了《明实录》，此书为明代史料的渊薮，自然在所必读。全书 133 册，又无索引可资利用，所以只好硬着头皮，在教书之余每

周阅读一册。这一走马观花式的阅览就花去了两年半。除此而外，参考奏疏笔记、各地方志，搜寻国内外有关的新旧著作，费时更多。此书从计划撰写到杀青定稿，历时 7 年，1974 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。

结论从材料中来。多年以来摸索于材料之中，我对明史中的若干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初步看法，开始摆脱了人云亦云的束缚。这些看法容或有所不当，但多少总可以有助于学术界的探讨。

比如，过去关于明史的叙述，几乎无不有“税重民穷”的说法。如果意在说明当日的官僚贪污百出，无力的百姓被摊派的赋役过重，富者愈富，贫者愈贫，这可以言之成理。要是认为全国税收总额过高而导致百姓贫困，则与事实有所出入。16 世纪末，全国田赋额最重的为南直隶苏州府，约占农村收入的 20%。此外各府县一般都在 10% 以下，其中又有轻重的不同，山东曹县全县的赋役约占农村收入的 9%，去苏州不远的溧阳县，情形就更为奇怪，约在 1—5% 之间。而以比例而言，与此同时的日本大名政权，税额占收入的 50%。以总额而言，17 世纪末期的英国，人口为五百万，税收每年竟达七百万英镑，折合约银两千余万两，和人口为三十倍的中国大体相埒。据此而作进一步探索，可知“民穷”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，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。国家的税率

低，受惠者并非农民，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。

中国幅员广大，情形复杂。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，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，以增益全国财富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，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。这种情形，在世界史中实属罕见，在中国历史中也以明代为甚，而其始作俑者厥为明太祖朱元璋。下面一例可以作为管中窥豹。洪武二十一年（1388），朱元璋亲自指示，让人民纳税实物不入仓库，直接供应于军士的家庭，军士则不再发给军饷，并规定先在应天府抽派若干税民，和金吾卫的五千军士对口。试验一年以后，朱元璋认为成绩良好，乃通令全国一体施行。这一办法之脱离实际，窒碍难通，自不待言而自明，于是只好虎头蛇尾，销声匿迹。这种安排虽然不再执行，但与之相适应的其他经济措施，则依然危害极大。如果军需税收总收总发，国内的交通通讯必然相应而有较大的进步，次之则银行业、保险业就会应客观的需要而产生，商业组织和法律也会有所发展。各地区既互通有无，以后就可以分工合作，各按其本地的特殊情况而发展其生产技术。西欧各国在14世纪已经朝着这一方向前进，日本在德川幕府末期，亦复如是。而明代的财政税收制度则和民间经济的发展相脱节。万历二十年（1592），北京的宛平县知县沈榜声称，

他每年要向 27 个不同的机构交款，总数则不出白银两千两。与此相似，全国布满了这短距离的补给线，此来彼往，侧面收受，既无架构，而提出的统计数字，经常为一纸具文，以致发生了上述税率参差不一的现象。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、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，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。1972 年，我去英国剑桥，参加李约瑟博士主持的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的工作，历时一年，兹后我又几次有机会旧地重游，向李公学习。上述看法，我们已写为“*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: A Technical Interpretation*”一文，曾在罗马和香港两处发表。李公 1974 年 4 月 30 日在香港演讲，也以此文为讲稿，后节译为中文，刊载于香港的《七十年代》杂志。

我们也很难同意这样一种看法，即认为在明代万历年间，中国的封建经济已向资本主义经济进展。<sup>[1]</sup> 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，一种系统。即马克思在《资本论》第二卷中论述资本主义的流通方式，其公式亦为 C-M-C，即商品（Commodity）交换为货币（Money），货币又再交换为商品，川流不息。但是货币是一种公众的制度，它把原来属于公众的权力授予私人。私人资本积累愈多，它操纵公众生活的权力也愈大。同时，商业资本又是工业资本的先驱，商业有了充分的发展，工业的发展才能同样地增进。这是欧美资本主义发

展的特征。中国的传统政治既无此组织能力，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，为王朝的安全之累。

明代张瀚<sup>[2]</sup>所著的《松窗梦语》中，记载了他的家庭以机杼起家。中外治明史的学者，对这段文字多加引用，以说明当时工商业的进步及资本主义的萌芽。其实细阅全文，即知张瀚所叙其祖先夜梦神人授银一锭、因以购机织布云云，乃在于宣扬因果报应及富贵由命的思想。姑不论神人授银的荒诞不经，即以一锭银而论，也不足以购买织机，所以此说显然不能作为信史。同时代的书法家王世懋，在《二酉委谈》中提到江西景德镇烧造瓷器，火光烛天，因而称之为“四时雷电镇”。当代好几位学者据此而认为此即工业超时代发展的征象。实则王世懋的本意，是在于从堪舆家的眼光出发，不满当地居民穿凿地脉，以致没有人登科中举；而后来时局不靖，停窑三月，即立竿见影，有一名秀才乡试中式。

如是等等的问题，其症结到底何在，这是研治明史者所不能不认真考虑的。笔者以为，中国两千年来，以道德代替法制，至明代而极，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。写作本书的目的，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。这一看法，在拙著《财政史》中已肇其端。本书力图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大众化，因而采取了传记体的铺叙方式。书中所叙，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。因为叙及的主要人物，有万历皇帝朱

翊钧，大学士张居正、申时行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，蓟州总兵官戚继光，以知府身分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，他们或身败，或名裂，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。即便是侧面提及的人物，如冯保、高拱、张鲸、郑贵妃、福王常洵、俞大猷、卢镗、刘𬘩，也统统没有好结果。这种情形，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释，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，上自天子，下至庶民，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。

在上述前提之下，对具体历史人物的具体评论，就难免有与国内外明史研究专家有出入之处。例如万历皇帝，历来均以为昏庸，读者在读毕本书以后，也许会认为笔者同情这位皇帝。如果真有这样的批评，笔者将不拟多作无益的辩解。因为本书论述万历，本在于说明皇帝的职位是一种应社会需要而产生的机构，而每一个皇帝又都是一个个人。又比如海瑞，这也是一个容易惹起是非的题目，十五年前的一段公案，至今人们记忆犹新。在本书中专设海瑞一章，并不是要在这段已经了结的公案再来画蛇添足，而意在向读者介绍当日地方政府的一些形态。有关 16 世纪地方行政的资料不多，沈榜的《宛署杂记》所载，为京师的情形而非一般概况，顾炎武的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过于琐碎，唐鹤征的叙南直隶、归有光的叙浙江长兴县，也都有欠完整。相形之下，海瑞的遗墨，涉及当日地方政府的各个方面，最具参考价值。研究海瑞其人其文，可以使

我们对当日的情形有更具体的了解。当然，问题还远不止此，比如何以万历的立储问题业已解决而争执却绵延不断？何以岛国日本可以侵犯中国而中国却不能远征日本？何以当日的西欧已经用火器改进战术而中国还在修筑万里长城？何以人人都说海瑞是好官而他却偏偏屡遭排挤？这些具体问题，无疑和上述总的症结密不可分，然而却各有其特殊的原因。笔者写作此书时，虽已不同于过去的暗中摸索，但下笔时仍然颇费踌躇。书中所提出的答案，均属一得之见，敬请读者批评指正。

中国的过去，禁忌特多，所以说话作文时有隐晦，或指彼而喻此，或借古以讽今，这在明朝人更为惯技。本书论述明朝时事，举凡有所议论臧否，都是针对 16 世纪的历史而发的。如果我要对今人今事有所议论，自当秉笔直书，决不愿学明朝人的办法，否则就是违反了自己写书的目的。当然，另一方面，以古为鉴，今人也未尝不能得到若干启示。这本《万历十五年》，意在说明 16 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，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。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，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，恢复故态决无可能，因之而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、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。

本书由英文译为中文，因为国内外情况的差别，加之所译又是自己的著作，所以这一翻译实际上是一种译写。笔者离祖国已逾三

十年，很少阅读中文和使用中文写作的机会，而三十年来的祖国语言又有了不少发展，隔膜更多。幸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沈玉成先生将中文稿仔细阅读一过，作了文字上的润色；又承中华书局编辑部傅璇琮先生关注，经常就各种技术问题与笔者书函磋商。所以，本书与读者见面时，文字方面已较原稿流畅远甚。其有创意遣辞方面根本性的不妥，当然仍应由笔者负责。又，廖沫沙兄为笔者年轻时的患难之交，蒙他在百忙中挥翰题签，为本书生色不少。谨此一并致衷心的谢意。

黄仁宇  
1981年1月于美国

[1] 今天通用的“封建”一词，是日本学者在一百年前从 Feudal System 翻译过来的。其实，中国的官僚政治，与欧洲的 Feudal System 差别很大。当时译者对中国明清社会的详情并不了解，而欧洲的 Feudal System 也只是在近三四十来年，经多数学者的苦心研究，才真相大白。本书的英文本论述明代社会，避免了 Feudal System 的字样，在中文本中也不再用“封建”一词来概括明代的政治与经济。

[2] 此人官至吏部尚书，因张居正夺情一事去职，见本书第一章。

## 目 次

自 序	1
第一章 万历皇帝	1
第二章 首辅申时行	61
第三章 世间已无张居正	106
第四章 活着的祖宗	150
第五章 海瑞——古怪的模范官僚	186
第六章 戚继光——孤独的将领	228
第七章 李贽——自相冲突的哲学家	282
参考书目	338
附录一	347
附录二	351
《万历十五年》和我的“大”历史观	356

# 第一章 万历皇帝

公元 1587 年，在中国为明万历十五年，论干支则为丁亥，属猪。当日四海升平，全年并无大事可叙，纵是气候有点反常，夏季北京缺雨，五六月间时疫流行，旱情延及山东，南直隶却又因降雨过多而患水，入秋之后山西又有地震，但这种小灾小患，以我国幅员之大，似乎年年在所不免。只要小事未曾酿成大灾，也就无关宏旨。总之，在历史上，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。

既然如此，著者又何以把《万历十五年》题作书名来写这样一本专著呢？

1587 年，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。当年，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。这些事件，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，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，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。其间关系因果，恰为历史的

重点。

由于表面看来是末端小节，我们的论述也无妨从小事开始。

这一年阳历的3月2日，北京城内街道两边的冰雪尚未解冻。天气虽然不算酷寒，但树枝还没有发芽，不是户外活动的良好季节。然而在当日的午餐时分，大街上却熙熙攘攘。原来是消息传来，皇帝陛下要举行午朝大典，文武百官不敢怠慢，立即奔赴皇城。乘轿的高级官员，还有机会在轿中整理冠带；徒步的低级官员，从六部衙门到皇城，路程逾一里有半，抵达时喘息未定，也就顾不得再在外表上细加整饰了。

站在大明门前守卫的禁卫军，事先也没有接到有关的命令，但看到大批盛装的官员来临，也就以为确系举行大典，因而未加询问。进大明门即为皇城。文武百官看到端门午门之前气氛平静，城楼上下也无朝会的迹象，既无几案，站队点名的御史和御前侍卫“大汉将军”也不见踪影，不免心中揣测，互相询问：所谓午朝是否讹传？

近侍宦官宣布了确切消息，皇帝陛下并未召集午朝，官员们也就相继退散。惊魂既定，这空穴来风的午朝事件不免成为交谈议论的话题：这谣传从何而来，全体官员数以千计而均受骗上当，实在令人大惑不解。<sup>[1]</sup>